

社科论集

中国商业文学发展概论

■ 周柳燕 等著

■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4—2005 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重点立项资助课题

中国商业文学发展概论

周柳燕 主编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科论集/朱小平,陈书良主编, -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4.7

ISBN 7 - 80608 - 986 - 1

I. 社… II. ①朱…②陈…… III. 社会科学 - 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9494 号

中国商业文学发展概论

周柳燕 等著

责任编辑: 温雅莉

装帧设计: 梅 林

出版发行: 甘肃文化出版社

印 刷: 湖南省政协机关印刷厂

社 址: 兰州市庆阳路 230 号

厂 址: 长沙市芙蓉区燕山街祇园庵 4 号

邮政编码: 730030

邮 政 编 码: 410001

电 话: (0931)8454870

承 制: 湖南省越来越好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电 话: (0731)2322222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字 数: 260 千字 印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次

印 张: 13 印 数: 1 - 1000 册

书 号: ISBN 7 - 80608 - 986 - 1

全套定价 168.00 元

顾 问:谢伯端、柳思维

主 审:陈书良

主 编:周柳燕

副主编:杨 虹

撰 稿(按姓氏笔划排列):

陈书良、肖 芮、杨 虹、张铁军

周俊敏、周柳燕、彭 昊、潘沅汶

文学史研究的空间拓展

季水河

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学史家,是比较忽视文学与商业关系研究的,至于撰写中国商业文学史,更是他们不曾想过的事情。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着重义轻利,重农轻商的思想观念,文人墨客们往往以言义为荣,言利为耻;视农为正,视商为邪。他们笔下的商人,或是重利轻别的寡情之人,或是见利忘义的无耻之徒。他们忘记了这样一个基本常识:“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恩格斯语)。而吃、喝、住、穿,则不是单人独户可以独立实现的,它至少包括两个环节的活动:生产和交换。生产是工业、农业活动,交换则是商业活动。商业活动的原始形态为以物易物,成熟形态是以钱换物。从中国古代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到中国当代的小说和影视,一直都有对商业活动的描写。由是观之,中国的文人虽耻于言利言商,但他们实际上是置身于利商之中的,除非他们不吃、喝、住、

穿。进而言之，重视商业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撰写中国商业文学史一类的学术著作，也应成为中国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应有之题。

湖南人素有敢为天下先之美誉，在学术研究中也不例外。2004年8月，湖南理工学院的邱绍雄先生，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学术著作《中国商贾小说史》。不出三月之久，湖南商学院的周柳燕女士，又推出了她主编的《中国商业文学发展概论》。据本人浅识，湖南的商业文学研究，应该是走在国内学术界前列的。

周柳燕女士主编的《中国商业文学发展概论》一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具有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中国商业文学发展概论》，是一种比较难于把握的文学专题史著作。商业尚实，文学尚虚。写商业文学史，稍不注意就可能把具有审美特性的文学作品还原为缺少诗意图的商业活动。本书作者始终以审美意识，把握中国商业文学的发展；以艺术眼光，捕捉中国商业文学中的审美信息。如对早期商业诗歌作品的解读，就紧紧扣住诗歌语言的艺术性展开。而对后来商业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分析，始终将其定位在艺术形象而非商人代表这一层面。从而突出了《中国商业文学发展概论》文学的审美特性，淡化了其商业的功利色彩，使该著真正成为了商业文学史，而非商业文学史。第二，具有高度的历史概括力。相对于整个中国文学而言，中国商业文学仅是其中的一个分支，一个子系统。但就中国商业文学自身看，它又是丰富芜杂，博大宏阔的。要在有限的篇幅之内，叙述中国几千年商业文学发展的历史，必须具有很强的历史概括力。本书作者就具有这种能力。对每个时期商业文学发展特点的概括，要言不繁，理显意明；对整个中国商业文学历史的叙述，脉络清晰，分期准确。全书的结构布局，是颇费心思的。点与面，虚与实，结合

到位,协调有度。第三,具有强烈的理论穿透力。写文学史,需要清楚的叙述,但又不止于叙述。如果停留于叙述,那将是非常浅泛的。好的文学史,一定是史与论的结合,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本书作者在逻辑推论,理论提升方面,也是下了功夫的,体现了很强的理论穿透力。如作者对商业文学的义界和商业文学内含的概括:“一切与商业活动有关的文学作品或典籍,都可称之为商业文学。其内含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描写商业都市、贸易活动、商人形象的诗文作品;二是反映文人与商界交往,相互影响的有关篇章;三是渗入商业经营,为商业经济服务的各种载体的文学表现形式;四是记载文人商业经济思想的典籍。研究中国商业文学的任务,是清理并叙述中国商业文学演变的过程,探讨其发展规律。”这一概括,既是对商业文学发展历史的理论升华,又对把握中国商业文学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尽管笔者不一定完全同意本书作者的观点,但是却不得不赞赏作者的理论穿透力。

中国商业文学史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周柳燕女士作为起步者之一,其主编的著作也许还不十分成熟,但她是一位勇于进取的研究者,其探索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商业文学史的研究还等待着她去深化,商业文学理论的研究还等待着她去拓展,相信她在今后的学术道路上,步伐会更加稳健,成果会更加喜人。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

目 录

文学史研究的空间拓展	季水河
绪 论	(1)
第一章 中国商业文学发展的萌芽期	(16)
第一节 先秦两汉商业发展概况	(16)
第二节 萌芽状态下的商业文学特点	(35)
第三节 先秦两汉商业文学撷萃	(61)
第二章 中国商业文学发展的滞缓期	(70)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商业文学发展的背景	(70)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商业文学作品解读	(76)
第三章 中国商业文学的初步发展期(上)	(88)
第一节 隋唐商业文学发展的背景和概貌	(88)
第二节 隋唐商业文学作品解读	(96)
第四章 中国商业文学的初步发展期(下)	(114)
第一节 宋元商业经济及文化生活状态概说	(114)

第二节 宋元商业文学的形成与发展	(124)
第三节 宋元商业文学经典作品解读	(146)
第五章 中国商业文学发展的成熟期	(156)
第一节 明清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及其影响	(157)
第二节 明清商业文学的发展概况及其特征	(187)
第三节 明清经典商贾小说解读	(229)
第六章 中国商业文学的稳定发展期	(248)
第一节 社会变革时期的商业文学发展背景	(248)
第二节 近代商业文学发展概况	(263)
第三节 近代经典商业小说解读	(276)
第四节 透露近代商业文化气息的竹枝词	(306)
第七章 中国商业文学的空前繁荣期	(320)
第一节 计划经济体系的构建与商业文学的政治化 书写	(320)
第二节 商品经济的勃兴与商业文学的转折	(332)
第三节 社会的商业化进程与商业文学的蓬勃发展	(350)
第四节 商业时代的商业文学作家、作品解读	(374)
主要参考书目	(395)
后记	(401)

绪 论

—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但检阅流光溢彩的文学长河，我们发现这样一个现实：长期以来学术界在对地域文学、领域文学研究痴迷时，却令人遗憾地忽略了商业文学，而历史在中国商业文学领域留下的并非荒漠。首先，从“氓之蚩蚩，抱布贸丝”（《诗经·卫风》）中始乱终弃的小商人（《毛传》释“氓”为“民”，《韩诗》以“氓”为“美貌”。按《孟子·公孙丑上》：“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廛，然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杨伯峻释为“盖自他归

徙之民则谓之氓，故字从民亡。”从杨说。《卫风·氓》之氓为“侨民”，因其“抱布贸丝”，故应是一小商人)到艰难行贾的孤儿(《孤儿行》)、到是商神也是情圣的胡雪岩(高阳《胡雪岩》)，商人及商人行为作为“另类”，始终吸引着文人墨客敏锐的目光，不管是“青眼”，还是“白眼”。其次，商品经济发达带来城市繁荣，熙攘的都市与云树烟山大异其趣，似乎也激发了文人们的万丈豪情：张衡的《西京赋》用瑰丽宏富的翰藻，展示了“商贾百族”“瑰货方至，鸟集鳞萃”的豪富；柳永的《观海潮》则用清新的词句摹写了“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的盛况。此外，在黄金白银的交易中，在算盘筹珠的跳动声里，也演绎着一个个风流故事：“文君当垆，相如酤酒”，妇唱夫随，心心相映，令千载以下的文人艳羡不已；“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商妇的琵琶夜语，使得大诗人白居易涕泣嗟呀，夜不能寐；而最妙的是忠厚老实的卖油郎秦重，竟然博得了美貌的花魁娘子的千重似束的芳心……总之，应该承认，中国商业文学的存在，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然而，作为“中国商业文学”这一观念，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对它的认识、梳理、诠释和研究，相对于它的存在，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需要指出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重大变化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界对这个时期出现的新事物、新变化，都反映到放言无忌的论战之中；并且，这些论战中形成的观点又长期地对新事物的发展产生影响。商业贸易也不例外。当时，孔子推崇以“均”“固穷”，墨子主张“固本以用财”，孟子强调“物之不齐”，庄子宣扬“同乎无欲”，荀子提倡

“节用裕民”，他们都将敏锐的目光投向了新兴的商贸，用自己睿智的头脑对商贸的走向进行了探索，并且试图用自己巨大的学术能量和社会影响对其施加规导。然而，随着秦汉的一统宇内，随着西汉封建王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人们普遍崇尚重义轻利价值观，而重义轻利的内核与商业经济趋利的本质扞格不入，于是就导致鄙视商人和商品经营的传统观念形成，加之历代封建政府大多重农抑商，商人便被斥为无商不奸、“末技游食之民”，商业也被视为“奸伪之业”。

在这种观念的规导下，中国商业文学当然遭到了历史的冷遇。这里，我们提出的是“中国商业文学”，并不是指其中的某些名篇，如汉乐府《孤儿行》、白居易《卖炭翁》等，在这个问题上，整体的否定并不妨碍个体的肯定。从文学史的角度考察，我们注意到，和史所艳称的边塞文学、田园文学相比较，人们似乎漠视中国商业文学的存在。历史上没有一本书进行文学分类时将它单列，当然也就更谈不上进行深入的研究了。其实，中国文学的传统就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用文学手段反映现实，中国的商贸与时俱进，历代文人早就将商业与文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在现代高度发达的商业经济社会里，我们没有理由漠视商业文学的存在，拒绝对它的研究。于是我们不揣冒昧地在这里提出了商业文学的概念。（此前，有很多论著、论文论述古代作品中的商人形象，已有专著论及“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经济问题。”见沈瑞民《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经济问题》西南财经版）

存在的确定并不代表义界的清晰。那么，什么是商业文学呢？我们认为：一切与商业活动有关的文学作品或典籍，都

可称为商业文学,其内含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描写商业都市、贸易活动、商人形象的诗文作品;二是反映文人与商界交往,相互影响的有关篇章;三是渗入商品经营,为商业经济服务的各种载体的文学表现形式;四是记载文人商业经济思想的典籍;研究中国商业文学的任务,是清理并描述中国商业文学演变的过程,探讨其发展规律。

二

马克思指出:经济是基础,文化是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文化,文化会反作用于经济。回顾中国商业经济的发展,历经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先秦与西汉的萌芽成长、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的迟滞,隋唐至宋元的繁荣,明清的加速发展、近现代时期的突变与新时期的迅猛推进。其中涌现大批商业经济思想家:贾谊、司马迁、陆贽、王夫之、郑观应、龚自珍等,他们对商业功能的认识逐步丰富,整理、总结了大量有关商业经营的经验与思想,推动了商业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城市的繁荣。同时,商业经济的发展又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文学与商业经过不断的纠葛、渗透、相互影响,出现了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商业文学。这种根植于中华民族几千年商贸经济生活的文学作品,不仅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商业的交流与融合,更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容。

纵观中国商业文学,我们发现,它与中国商贸几乎是同步的产生与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六个时期。

(一) 中国商业文学萌芽期

这一时期,包括历史上的先秦至两汉时期。春秋时期,文

学即有意识地反映社会经济生活,如《卫风·氓》之讽刺始乱终弃的小商人,《魏风·硕鼠》之反映奴隶主的赋税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说,《诗经》是形象的奴隶社会经济发展史。到春秋末期,中原地区经济繁荣,不仅活跃着走乡串村的小商贩,而且出现了长途跋涉的商旅。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舞台上,才出现了《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弦高智退秦师”那样神妙绝伦的文字。

秦始皇一统六合,为了巩固封建政权,采取了焚书坑儒等残酷的镇压措施,文人墨客噤若寒蝉。这时,只有李斯《谏逐客书》从“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四方”名优产品以富国强民的经济主张。同时,《谏逐客书》从文学角度来看,也是一篇精谨畅达的千古名篇。西汉初“休养生息”,注重加强经济基础的建设,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安定局面。统治者采用一系列比较开明的经济政策,恢复了社会生产,促进了商业繁荣。当时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大者“积贮信息”,小者“坐列贩卖”,日游都市,攫取钱财。司马迁在其史学巨著《史记》中还专辟《货殖列传》,替二十多位富商大贾树碑立传,总结了他们的经营之道。《货殖列传》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商业传记文学。因为商贸的发展,许多城市一改过去单一政治军事中心,成为“东贾齐鲁,南贾梁楚”的商业大都会。城市繁华,为汉代主流文学辞赋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新题材,即京都赋。这也是商业文学的一种重要表现体式。其中萃萃大者如杨雄的《蜀都赋》,傅毅的《洛都赋》、崔骃的《历都赋》,最有影响的当推西汉班固的《西都赋》与东汉张衡的《西京赋》。张衡在《西京赋》中铺写了市场上商品琳琅满目、堆积如山、人们熙攘、频频交换、忙碌

纷然的情况，“五都货殖，即迁且引；商旅联舞，隐隐展展”，再现了汉代商业都市的迷人风采。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西汉重农抑商，“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史记·平准书》）。广大商人，特别是小商贩，命运是十分凄苦的。汉乐府《孤儿行》就记叙了一个饱受兄嫂欺凌的孤儿的血泪控诉：“兄嫂命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诗歌用第一人称娓娓道来，催人泣下，感人肺腑。

（二）中国商业文学的缓滞期

魏晋南北朝，长期的分崩离析，频繁的天灾人祸，社会经济被破坏得荡然无存。尤其是东汉末年盛行的门阀制度绵延至西晋，愈演愈烈，造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不合理现象（《晋书·文苑·王沈传》），也造成了“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廿二史札记》）的巨大的不公平。百家过江，又将东汉西晋士族的全部腐朽性移植到山明水秀的长江流域。在壁垒森严的门阀制度下，商人当然是等而下之的了。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及学术虽是灿烂辉煌，但商业文学发展进程却呈缓滞之势，无论是内容抑或形式，较之先秦两汉没有多大突破。较为有名的为西晋左思的《三都赋》、北朝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等。倒是干宝《搜神记》、刘义庆《世说新语》等小说对社会经济的现状、财富此盈彼虚的演变，以及围绕经济而开展的矛盾和斗争，作出了较为生动的描写和揭示。

（三）中国商业文学的初步发展期

这一时期包括历史上隋唐宋元朝代。公元581年，杨坚灭陈称帝，之后货币的统一和南北大运河的开凿，为商业经济

复苏创造了良好条件。到了唐朝李世民即位,实行惠民恤商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政治的统一与稳定,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使得中国封建社会商业经济出现了继先秦、西汉之后的第二次兴盛。其标志之一是社会将经商视为一个重要职业,出现了经商热潮,不少才俊之士甚至抛下书本,甘愿“贩牛骆马,以周四方”。人们对司马迁的“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及“财富足而知礼仪”的思想倍加赞许与推崇。这种思想观念的变化是商业经济发展与商业在社会中地位提高的事实在人们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人们选择迅速致富的商业作为自己的职业。姚合的《庄居野行》、张籍的《贾客乐》、元稹的《估客乐》等诗作就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上“趋之若鹜”的经商热潮。隋唐商业经济兴盛的标志之二是市场贸易的繁荣,据《长安志》载,唐朝长安东西两市商业兴隆,“东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之邸,四方奇珍,皆所积聚”。而此时市场制度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不再是古代“交易而退”的“日中为市”了,成了颇似现代城市的商业区,除了正规的城市市场外,中唐还出现了“草市”、“夜市”及“宫市”。晚唐诗人王建《汴洛即事》、杜牧《上江李太尉论赋》均是对农村商业的描绘,而白居易正是目睹宫市之后,写下了流传至今的《卖炭翁》。隋唐商业经济兴盛的标志之三是中西贸易活跃,尤其是“丝绸之路”,不仅是友谊之路,更是重要的贸易之路,裴矩的《西域图记》、张籍的《凉州词》均对这条路线上的贸易往来作了生动的描绘。并且在当时黄沙漫漫驼铃声声的经商大军中,我们还可看到胡商——外国商人的身影。如杜甫的《滟滪》所云;“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楼故驿楼。”

由于隋唐良好的基础及两宋本身的发展,宋代的商业达

到了封建社会商业比较成熟的繁荣阶段,商业经营有了长足提高,城市更加繁荣,这一切在此时的商业文学中得到最好例证。柳永、欧阳修、陆游、范成大、姜夔等人的诗词或记叙了街市的欢乐,或追忆着昔日的繁华,生动地体现了商贸的勃然发展给文学注入的无穷活力。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则似一段清晰优美的解说词与同时代的绘画杰作《清明上河图》交相辉映;吴自牧的《梦粱录》《武林旧事》带领我们欣赏了杭州的名贵与富丽。尤其让我们叹为观止的是北宋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商标“白兔”,在白兔图案的下方,老板匠心独运地写上一段宣传自家产品的文字,这大概便是广告文学的雏形。印刷这商标的铜版,目前还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它在反映当时经济繁荣的同时,显示了文学服务经济的功能。

因为元统治者重视商业,“元以功利诱天下”,使得终元之世商人异常活跃,工商业的发展也使原有和新兴的重要城市呈现空前的繁荣,迎来了通俗文学大发展。尤其是南北统一以后,东南沿海城市经济的迅速崛起,不但吸引北方杂剧家南下,而且使这种北方文学样式迅速在全国的城市热热闹闹地上演,创作出反映商人社会活动以及生活思想的作品,如无名氏《来生债》、秦简夫《东堂老》等杂剧,使元曲和元杂剧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蕴含极为丰富的经济生活的样式。

在劲吹的商风熏染下,元代诗人也将青眼投向流金溢银的商埠,自觉与城市生活联系,如萨都刺、顾瑛、王冕等,在诗中富于世俗生活的情调,讴歌城市繁荣,尤其是儒者兼富商的顾瑛《三二年来,商旅难行、畏途多棘,政以为叹,徐君宪以〈雪景盘车图〉求题。观之风雪载,不能无戚然也,遂为之赋云》一诗,以商人身份写商人生活,堪称元代商业文学诗文佳